

二轮延包的公平路径： 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能否促进农户政策支持？

安海燕¹，张家源¹，何金彪^{2*}

(1.贵州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构建公平路径并提升农户对政策的支持度，是确保二轮延包工作顺利推进的核心。基于贵州省 XF 县、河南省 PY 县试点探索，并借鉴 IAD 框架，探讨通过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搭建二轮延包过程公平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1) 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作为 IAD 框架中的相互作用部分，理论上可发挥过程公平作用；(2) 二轮延包中，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体现在“政策宣传”与“方案制定”两环节。两试点地有着不同的设计模式，且河南省 PY 县的公平效用要强于贵州省 XF 县；(3) 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能显著提升农户政策支持度，两者存在交互效应，且可通过农户公平感知影响农户政策支持度。各地应重视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设计体现公平的延包实施方案、强化延包实施的过程公平、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动态公平管理机制。

关键词：二轮延包；信息公开；民主协商；农户公平感知；农户政策支持

中图分类号：F30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25)01-0091-12

Fair path of second round extension: C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promote farmers' policy support?

AN Haiyan¹, ZHANG Jiayuan¹, HE Jinbiao^{2*}

(1.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2.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ng a fair pathway and enhancing farmers' support for policies are central to ensuring the smooth advancement of the second round of rural land extension. Based on pilot studies in XF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and PY County, Henan Province, and drawing on the IAD framework, this paper explores feasible pathways for fairness in the contract extension process through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as interactive components in the IAD framework, theoretically contribute to procedural fairness; (2) in the second-round contract extens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are reflected in the two stages of "policy dissemination" and "plan formulation". The two pilot sites adopted different design models, with the fairness effectiveness in PY County, Henan Province, outperforming that in XF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3)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 farmers' support for policies, exhibit interactive effects, and influence farmers' policy support through their perception of fairness. It is proposed that localities should emphasiz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design a fair land extension program, strengthen the fairness of the extension process, and establish a dynamic and fair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rural land contracting and management rights.

Keyword: the second round of extens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farmers' perception of fairness; farmer policy support

收稿日期：2024-08-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JY040)

作者简介：安海燕(1979—)，女，贵州铜仁人，教授，主要从事农村发展和土地政策的研究。*为通信作者。

一、问题的提出

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以下简称“二轮延包”)是我国践行“长久不变”农

地制度的关键。国家为顺利推行二轮延包工作,采用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的推进方式。一方面,国家从上至下制定二轮延包政策。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延包期限为30年”“延包时不打乱重分”“延包后继续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三个实施原则。另一方面,国家有序开展二轮延包试点工作,并于2020—2024年逐步推进整村、整县、整省试点,由下至上探索二轮延包实施路径。

在国家政策未出台前,学界有不同的二轮延包主张。大部分学者提倡继续推行30年期限^[1,2],也有学者倾向永久承包制^[3]。延包方式上,既有研究提出了大调整^[4]、小调整^[1,5]和顺延^[6,7]三种不同的观点。尽管国家一直提倡“生不增,死不减”的稳定农地制度,但部分地区在实践中,仍在进行不同程度的农地调整^[8,9],即便在农地确权期间,也有16%的农户土地被调整^[7]。近期,学界关注了农户对二轮延包的政策支持度^[10,11]。研究表明,随着二轮延包的临近,农户的土地调整意愿已增至56.72%^[5]。同时,新出生人口、嫁入媳妇、进城农民等群体的“不公平感”亦日益凸显^[6]。数据调查显示,仅有56%的农户明确表示支持二轮延包政策^[11]。

学界对二轮延包的实施路径也进行了大量探讨。娄磊等^[12]基于Y省试点的实践,提出“调利不调地”的延包路径,姚志^[13]建议探索“确权确股不确地”的延包方案,刘灵辉等^[6]主张利用村集体力量和农村社会福利推进二轮延包。以上研究均指向“如何通过小调整”实现“结果公平”的二轮延包路径。根据公平理论,起点、过程和结果均可达成公平途径^[14]。那么,除关注结果公平的小调整方案外,是否可聚焦二轮延包过程,构建更为优化的公平路径,最终提升农户对二轮延包政策的支持度?

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是体现过程公平的有效方式。信息作为个体决策的基础^[15],能否平等、低成本获取有效信息,是影响个体公平感知的关键因素^[16]。因此,地方政府在推动公共政策实施时,常采用信息公开手段^[17],体现执行的公平性、提高民众意见表达的积极性^[18]。民主协商是民众参与制度建设的过程^[19],在此过程中,利益主体可进行对话、协商、谈判,通过信息公开实现公平,化解冲突^[20]。民主协商作为一种集体决策机制,能汇集民众智

慧,更易于形成最优方案^[21]。通过民主协商达成的方案,在实施过程中更容易受到协商主体的监督,进一步提升公平性^[22]。

Elinor Ostrom提出的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关注制度实施过程中,行动者与制度的互动情形,以及如何塑造制度绩效^[23]。基于此,本研究借助IAD框架,基于对二轮延包试点贵州省XF县与河南省PY县的考察,探讨如何通过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搭建二轮延包的过程公平桥梁,以此提高政策实施效率。本文可能的贡献点:第一,将既有的理论研究拓展到实证,提炼试点经验,通过微观数据,量化公平过程及二轮延包政策绩效。第二,将研究焦点从二轮延包模式转移到过程,关注政策宣传阶段的信息公开,方案制定阶段的民主协商,丰富已有研究维度,也可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二轮延包实施路径参考。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一) 理论框架

IAD框架由外生变量、行动舞台、相互作用模式、评估准则以及评估结果五个部分构成^[23]。行动舞台是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空间,受到外生变量的影响。行动者在行动情景之下,通过互动产生结果^[24]。借助IAD框架,本文构建农户与二轮延包政策的互动过程,以及最终政策评价的分析框架(图1)。二轮延包的行动舞台包含了行动情景与行动者。行动情景指二轮延包政策框架下的行动场域,行动者包括政策对象(农户)与实施者(村集体、地方政府)。在行动舞台上,行动者相互作用,形成了政策与行动者、行动者与行动者的两种互动类型。其中,政策与行动者的互动反映的是农户嵌入政策的程度,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是农户与村集体、地方政府在二轮延包过程中形成的相互联结关系。公平是二轮延包的评估准则,农户对二轮延包政策的支持度是评估结果。

二轮延包的实施过程包含五个环节,契合IAD框架。第一,建立工作小组,负责延包方案制定、工作指导与过程监督,对应着行动舞台的搭建。第二,政策宣传,对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并向农户宣传政策。第三,制定方案,在国家制度框架下,结合区域特征制定二轮延包实施方案。第四,实施

方案，需在国家公平目标准则下进行。第五，结果评价，可通过农户对政策的支持度反映出来。在 IAD 框架中相互作用模式是过程公平的关键内容，对应二轮延包中政策宣传与民主协商环节。政策宣传环节可确定行动者能获取什么样的政策信息，与信息

公开程度相关；方案制定过程是利益群体博弈的过程，与民主协商相关。因此，可聚焦二轮延包中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探讨两者如何搭建过程公平路径及最终产生了怎样的作用绩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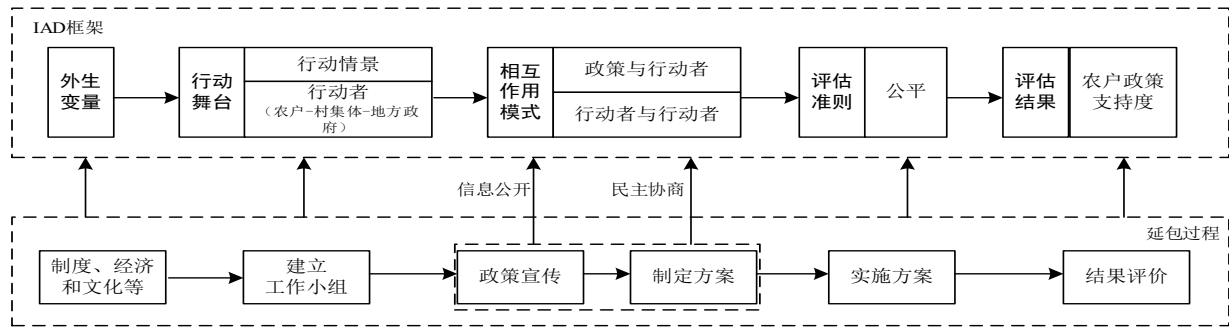


图 1 基于 IAD 框架的二轮延包分析框架

（二）研究假说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聚焦两个问题：第一，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在二轮延包中是如何运行的，是否构建了公平路径？第二，以上路径是否影响农户对二轮延包政策的支持度？

1. 信息公开与农户政策支持度

信息公开与农户政策支持本质上是政策与行动者的关系。地方政府、村集体作为政策实施者，是连接“国家”与“农户”的桥梁，拥有显著的信息优势^[25]。他们须确定信息的公开程度，具体包含信息类型及信息传递的形式。信息公开程度会影响行动者行为，一方面，公开的信息内容与公开程度会影响农户接收政策信息的广度和深度，即“信息充分性”。另一方面，个体观念、理解能力会影响其对政策信息的解读，即便相同的信息也有不同的解读^[26]，进而影响个体信息处理的准确度，即“信息准确性”。

信息贫困理论指出，“信息充分性”会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信息贫困的个体对外界不信任，缺乏获取外部信息的兴趣和能力。反之，信息充分的个体拥有多元化的信息渠道和社交网络，对新事物、新政策持积极态度^[27]。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信息充分的农户更容易提高个人收入、改变传统农业行为^[28,29]。“信息准确性”是个体对政策理解的正确程度，准确性越高表明其能正确理解政策，与政策达成共识，更容易形成积极评价，已有研究也验证了该推论^[30]。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₁：信息公开影响农户二轮延包政策的支持

度。

H_{1a}：农户接受的二轮延包信息的充分性越强，则政策的支持度越高。

H_{1b}：农户对二轮延包信息理解的准确度越高，则其政策的支持度越高。

2. 民主协商与农户政策支持度

民主协商与农户政策支持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民主协商过程主要是政策实施者（地方政府、村集体）与农户进行协商^[31]。一般而言，二轮延包方案有两种形成方式：一种是从上至下，由地方政府直接制定。该方式假设地方政府是完备的，能有效预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更具有权威性。另一类是从下至上，农户自发形成二轮延包方案。该方式假设农户有着丰富的农地经验和知识，在自发探索中形成最佳方案，更具有生命力。实践中，受时间、成本等的约束，政策实施者多融合两种方式，协同完成二轮延包方案制定。但不同试点在民主协商的“环节”“程度”“方式”等方面有不同的考量，由此形成了差异性的民主协商形式。

民主协商需建立在良好的协商平台上，这既是政策实施者与农户互动的基础，也是两者互动的结果。二轮延包中，地方政府、村集体搭建便捷、低成本的协商平台，更易于农户与政策之间进行良性互动。此时，农户不仅是政策的接受者，也是方案的参与者，会直接提高政策的支持度。如果民主协商环境较差，在信息不对称和缺乏参与的情况下，农户可能会形成“反正我是弱势群体”“我只能接

受”“我也无能为力”的认知,最终表现为低政策支持度。张广来等^[32]在研究易地扶贫政策时指出,民主协商制度的完善和执行协商力度的加大,能够有效提升农户的政策满意度,推动政策的有效实施。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H₂: 民主协商影响农户二轮延包政策支持度。

3. 信息公开、民主协商与农户政策支持度

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共同形成 IAD 框架中的相互作用模式,两者关联密切。信息公开是国家权力主体对公民、对社会的义务,是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33]。只有在信息充分且准确的情况下,民主协商才可行。同时,民主协商也需通过信息公开来展现,对协商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就是一条公平的路径,能让广大民众了解、形成共识并进行监督。两者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影响农户对二轮延包政策的评价。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₃: 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共同影响农户二轮延包政策支持度。

4. 农户公平感知的中介机制

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是公平原则的体现。信息公开被认为是向公众赋权的过程^[18]。2016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中强调:“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这是国家实施公平执法、管理的表现^[34]。政府的信息公开被视为“权力制约权利”,各地方政府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显著提高了民众的公平感知^[35]。当农户认为自身拥有充分的政策信息时,其自我效能感被激发,更易做出理性决策^[36]。如,地方政府在征地中公开征地信息,那么该区域农户的公平感知会加强,征地纠纷就较少^[37]。民主协商体现了程序公平,给予民众表达意见的机会^[38],创造公平的协商平台^[39],同时也可可为不同利益群体提供沟通交流的机会,强化公民的公平观。如,在“出嫁女”上访事件中,地方政府通过民主协商,提高上访者的公平感知,解决上访问

题^[31]。可见,理论上信息公开和民主协商通过公平感知最终影响农户政策支持度。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H₄: 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通过公平感知中介机制影响农户二轮延包政策支持度。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构建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多重逻辑视角下农地延包实施路径研究”课题组开展的实地调研。调研地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国家批准的二轮延包试点地;二是试点地已形成成熟的延包方案,且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三是试点具有差异性,兼顾不同地形特征。依据以上原则,课题组选择贵州省 XF 县与河南省 PY 县。贵州省 XF 县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分布区,山地广布、土地破碎,农户居住分散;2020年被列为国家首批 15 个二轮延包试点地之一,2021 年完成全县 160 个村的二轮延包工作。河南省 PY 县属于典型的平原地区,土地平整连片,农户居住集中;2022 年获批为二轮延包试点地,2023 年 6 月基本完成 WJD 镇、SZL 乡的试点工作,随后推进整县的二轮延包工作。依据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原则,共收回入户调查问卷 550 份,剔除关键变量数据缺失、前后作答不一致等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 532 份,其中贵州省 XF 县 237 个样本,河南省 PY 县 295 个样本,分别占比 44.5% 和 55.5%。

(二)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农户政策支持度。本文基于《意见》的三个原则,将农户对二轮延包政策支持度分解为“再延长 30 年”期限的支持度 ($FPS1$)、“不打乱重分(顺延)”的支持度 ($FPS2$) 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支持度 ($FPS3$)。进一步,在 $FPS1$ 、 $FPS2$ 和 $FPS3$ 的基础上,通过熵权法合成农户整体政策支持度 (FPS),测量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农户政策支持度测量统计结果

各项政策支持度	贵州省 XF 县		河南省 PY 县		全样本	
	户数	占比	户数	占比	户数	占比
$FPS1$	195	82.28%	258	87.46%	453	85.15%
$FPS2$	154	64.98%	230	77.97%	384	72.18%
$FPS3$	144	60.76%	237	80.34%	381	71.62%
FPS	0.6665		0.8079		0.7449	

注:问卷中农户需对 $FPS1$ 、 $FPS2$ 和 $FPS3$ 的三个问项分别作出回答,“户数”指支持该项二轮延包政策的户数,“占比”指支持户数占该区域总样本的比例。两地调研样本总量为 532 户。

整体而言，有 74.49% 的农户支持整体二轮延包政策，在分维度政策中，有 85.15% 的农户对“延长 30 年”期限表示支持，72.18% 的农户支持“顺延”政策，71.62% 的农户支持“增减不变”政策，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8,10]。在试点对比中，河南省 PY 县

的政策支持比例均高于贵州省 XF 县。

2. 核心解释变量

(1) 信息公开。两试点地的信息公开方式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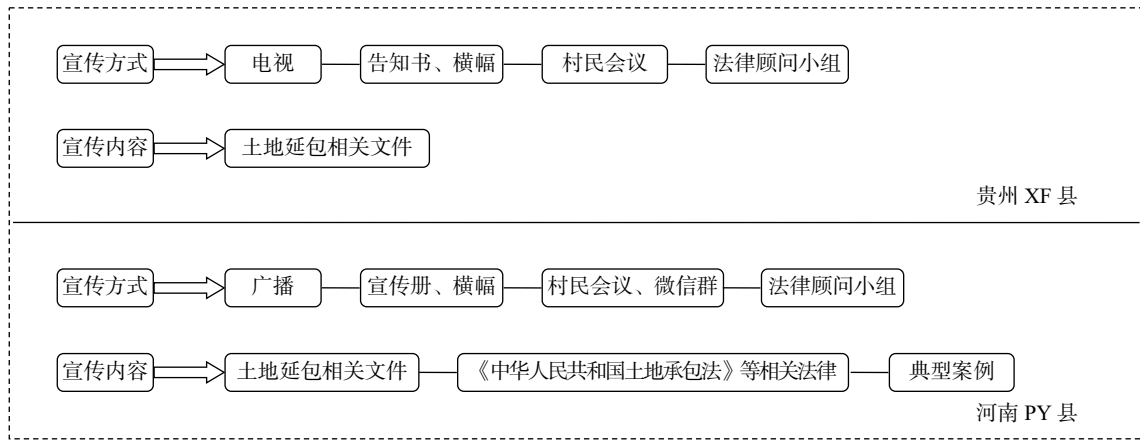


图 2 贵州 XF 县和河南 PY 县信息公开方案

在宣传方式上，两试点地区采用了多元宣传手段，如横幅、宣传册、多轮村民会议、设立长期法律顾问等方式。此外，河南省 PY 县还建立了以组为单位的微信群，进行信息交流和事务处理。从宣传内容看，二轮延包相关的文件是宣传的核心内容，除此以外，河南省 PY 县还宣传了与二轮延包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同时还宣传了二轮延包中的典型案例。

信息公开的量化。用农户自评“二轮延包政策了解程度”衡量“信息充分性”（Q1）；通过 9 个涉及二轮延包农地性质、农地处置等制度规定的题项（Q2—Q10），综合考量“信息准确性”。具体内容见表 2。

表 2 农户“信息准确性”统计结果

指标	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方向
Q2	您知道二轮延包期限有多长（其他回答=0；30年=1）	0.800 0	0.400 4	正
Q3	您知道二轮延包政策规定是否可以打乱重分(否=0；是=1)	0.205 8	0.404 7	负
Q4	您认为农地所有权归谁（其他回答=0；村集体=1）	0.182 7	0.386 8	正
Q5	二轮延包的是什么权属（其他回答=0；承包经营权=1）	0.344 2	0.475 6	正
Q6	您认为承包地是否应随人口变动而调整（否=0；是=1）	0.411 5	0.492 6	负
Q7	新出生人口是否应分土地（否=0；是=1）	0.623 1	0.485 1	负
Q8	城市落户的农户，是否应将地交回村集体(否=0；是=1)	0.498 1	0.500 5	负
Q9	已经被征收土地的获得补偿的农户，是否应分得土地(否=0；是=1)	0.203 8	0.403 2	负
Q10	农户撂荒的农地，村集体是否应该收回(否=0；是=1)	0.567 3	0.495 9	正

由表 3 可以看出，农户的“信息充分性”均值为 2.7312，处于有所了解但并不完全清楚的状态；农户的“信息准确性”总体均值为 0.4127，约 59% 的农户存在政策认知偏差。对比两试点地发现，河南省 PY 县农户无论是在“信息充分性”还是“信息准确性”上均高于贵州省 XF 县。

表 3 两试点信息公开程度

	贵州省 XF 县	河南省 PY 县	两地均值
信息充分性	2.004 2	3.315 2	2.731 2
信息准确性	0.364 8	0.434 2	0.412 7

注：“信息充分性”赋值 1~5 分别表示不了解、了解一小点、还行、基本了解、非常了解；“信息准确性”通过熵值法测度，范围为 0~1。

(2) 民主协商。两试点地民主协商过程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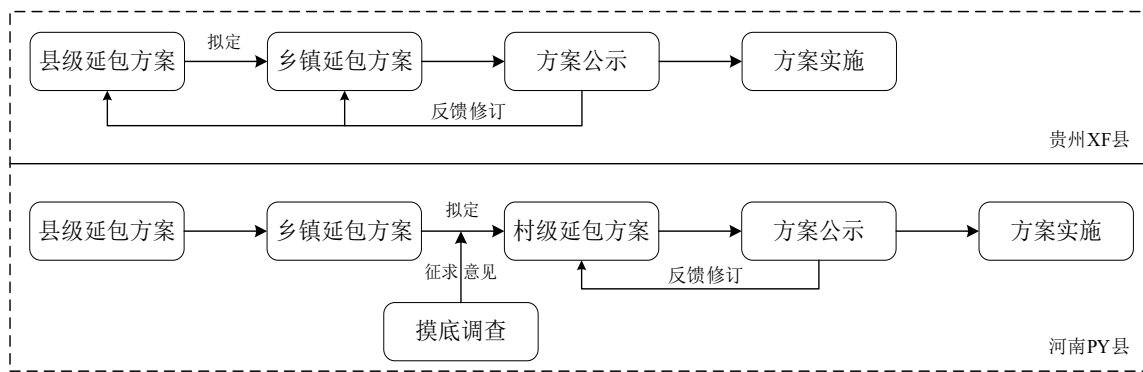


图3 两试点民主协商过程

两地的民主协商过程均经过了“初拟方案—修订方案—公示”三个阶段。贵州省 XF 县的民主协商侧重于公示阶段。由二轮延包小组负责初拟县级延包方案，下发至各乡镇征求意见，反馈修订后，再以村为单位公示。公示过程中，农户提出意见，由工作小组修订后继续公示，多轮后最终确定二轮延包方案。河南省 PY 县的民主协商强调村级的前期摸底调查，民意汇总后，结合区域发展特点，制定二轮延包方案。经过公示后，确定村为单位的二轮延包方案。由此可见，农户的民主协商在贵州省

XF 县主要体现在方案制定后的公示阶段，河南省 PY 县则在方案制定前的摸底调查和公示阶段。本文用“村干部是否征求过你家的意见”来衡量民主协商。数据显示，有 47.56% 的农户表示村集体征求过延包意见。从分试点来看，河南省 PY 县有 198 户、贵州省 XF 县有 55 户农户参与了民主协商。

3. 控制变量

为尽量避免由遗漏变量引发的内生性问题，借鉴相关文献^[40,41]，引入农户个体、家庭和农地特征层面变量，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户政策支持度	熵权法测度合成	0.744 9	0.371 0
	再延长30年政策	农户对再延长30年政策是否支持 (否=0; 是=1)	0.851 5	0.355 9
	不打乱重分政策	农户对延包“不打乱重分”是否支持 (否=0; 是=1)	0.721 8	0.448 5
	生不增死不减政策	农户对延包推行“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政策是否支持 (否=0; 是=1)	0.716 2	0.451 3
解释变量	信息公开	“信息充分性”: 农户对延包政策的了解程度 (不了解=1; 了解一小点=2; 还行=3; 基本了解=4; 非常了解=5) “信息准确性”: 熵权法测度合成	2.731 2	1.292 1
	民主协商	村干部是否征求过您家的意见 (否=0; 是=1)	0.412 7	0.191 9
中介变量	农户公平感知	您觉得村里二轮延包安排是否公平 (否=0; 是=1)	0.475 6	0.499 9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性别	女=0; 男=1	0.684 2	0.465 3
	年龄	受访人年龄, 单位: 岁	59.095 9	11.786 1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高中/中专=3; 大专/本科及以上=4	1.614 7	0.771 4
	家庭特征			
	家庭总人口数		5.492 5	2.605 6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	否=0; 是=1	0.195 5	0.396 9
	家庭年收入	取自然对数, 单位: 元	10.712 2	0.795 3
	家庭年收入水平	上层=1; 中上层=2; 中层=3; 中下层=4; 下层=5	3.171 1	0.838 6
	农地特征			
	农地确权情况	都未确权=1; 部分确权=2; 全部确权=3	2.892 9	0.431 6
	承包地总面积	单位: 亩	9.039 1	20.596 0
	承包地块数		4.984 4	4.874 6
	人均面积水平	少地=1; 平均数=2; 多地=3	1.827 1	0.623 0
	细碎化程度	非常高=1; 比较高=2; 一般=3; 比较低=4; 非常低=5	3.242 5	1.216 4
农地离家距离	单位: 千米	1.008 7	1.249 8	
农地是否流转	否=0; 是=1	0.328 9	0.470 3	
农地是否撂荒	否=0; 是=1	0.065 8	0.248 1	

(三) 模型构建

Probit 模型。基准回归中，农户的政策支持属于二值离散型变量，故建立 Probit 模型：

$$FPS_{iq} = \beta_0 + \beta_1 FPC_{ij} + \beta_2 DEC_i + \sum \beta_3 Control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 FPS_{iq} ($q=1,2,3$) 是农户政策支持度；信息公开 FPC_{ij} ($j=1,2$) 和民主协商 DEC_i 为核心解释变量； $Control_i$ 为控制变量， β_0 、 β_1 、 β_2 、 β_3 为待估计参数， ε_i 为随机扰动项。

交互效应模型。为探究信息公开和民主协商对农户政策支持度的交互效应，设定如下估计模型：

$$FPS_i = \gamma_0 + \gamma_1 FPC_{ij} + \gamma_2 DEC_i + \gamma_3 FPC_{ij} \times DEC_i + \sum \gamma_3 Control_i + \varepsilon_i \quad (2)$$

其中， $FPC_{ij} \times DEC_i$ 为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的乘积项； γ_0 、 γ_1 、 γ_2 、 γ_3 为待估计参数， ε_i 为随机扰动项。

中介效应模型。借鉴温忠麟等^[42]的思路，分析农户公平感知 (FPF) 的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SAT_i = \alpha_0 + \alpha_1 X_{ij} + \sum \alpha_2 X_i + \varepsilon_1 \quad (3)$$

$$FPF_i = \theta_0 + \theta_1 X_{ij} + \sum \theta_2 X_i + \varepsilon_2 \quad (4)$$

$$SAT_i = \gamma_0 + \gamma_1 X_{ij} + \gamma_2 FPF_i + \sum \gamma_3 X_i + \varepsilon_3 \quad (5)$$

其中， FPF_i 为中介变量农户公平感知； X_{ij} 中 $j=(1,2)$ 分别表示信息公开和民主协商。如果 α_1 显著则通过第一步检验，再检验系数 θ_1 、 γ_1 和 γ_2 。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使用 STATA17.0 软件，检验信息公开、民主协商与农户二轮延包政策支持的关系。对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VIF 最大值为 3.78 ($VIF < 10$)，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

表 5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受访者的个体、家庭和农地特征后，信息公开对农户政策支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户二轮延包信息了解越充分、信息理解越正确，对二轮延包的政策支持评价也越高， H_{1a} 和 H_{1b} 得以验证。民主协商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政策支持度，即地方政府和村集体与农户之间互动越频繁，农户对政策的理解程度越高，对二轮延包的政策支持也越高， H_2 得以验证。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均农地面积在 1% 显著水平上影响农户政策支持度，这也回应了二轮延包政策中需关注“少地”“无地”户群体的原则。农地确权负向影响农户政策支持度，在调研中发现确权过程中存在的地块错漏、亩分不对、家庭基本信息有误的情况在延包过程都有显现，这导致解决确权遗留问题成了二轮延包的主要环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户对二轮延包政策的积极评价。

表 5 信息公开、民主协商对农户二轮延包政策支持的影响

	农户政策支持度 FPS	“再延长 30 年” FPS1	“不打乱重分” FPS2	“生不增死不减” FPS3
	(1)	(2)	(3)	(4)
信息充分性	0.034 0** (0.014 1)	0.110 4* (0.066 9)	0.156 8*** (0.058 4)	0.101 9* (0.059 8)
信息准确性	0.356 4*** (0.082 9)	0.690 6 (0.443 7)	1.566 9*** (0.389 9)	1.531 7*** (0.388 9)
民主协商	0.176 1*** (0.034 0)	0.331 9* (0.169 7)	0.518 0*** (0.141 0)	0.813 4*** (0.148 8)
性别	-0.027 1 (0.033 5)	-0.262 8* (0.157 9)	-0.050 1 (0.133 6)	-0.194 3 (0.137 7)
年龄	0.000 2 (0.001 4)	-0.002 2 (0.006 7)	-0.004 1 (0.005 9)	0.007 6 (0.006 0)
受教育水平	-0.013 1 (0.022 2)	-0.030 4 (0.110 8)	-0.045 3 (0.092 7)	-0.040 1 (0.095 7)
家庭总人口数	0.000 6 (0.006 2)	0.011 1 (0.028 5)	0.003 8 (0.027 0)	-0.003 9 (0.027 3)
是否有村干部	0.013 2 (0.039 2)	0.600 8*** (0.215 5)	-0.028 1 (0.165 3)	-0.032 5 (0.173 0)

表5(续)

	农户政策支持度 <i>FPS</i>	“再延长30年” <i>FPS1</i>	“不打乱重分” <i>FPS2</i>	“生不增死不减” <i>FPS3</i>
	(1)	(2)	(3)	(4)
家庭年收入	-0.021 6 (0.022 9)	-0.119 9 (0.106 0)	-0.056 3 (0.089 7)	-0.113 1 (0.098 7)
年收入水平	0.017 5 (0.020 7)	0.159 4* (0.094 4)	0.092 9 (0.083 1)	-0.015 9 (0.087 8)
是否确权	-0.058 4* (0.034 8)	-0.254 4 (0.189 9)	-0.091 5 (0.142 8)	-0.348 5** (0.173 9)
承包地总面积	-0.000 1 (0.000 8)	0.003 8 (0.008 7)	0.008 1 (0.011 5)	0.004 6 (0.005 6)
承包地块数	0.006 4 (0.004 4)	0.015 8 (0.028 9)	0.009 4 (0.018 1)	0.020 4 (0.023 9)
人均面积水平	0.078 7*** (0.026 5)	0.440 5*** (0.129 8)	0.268 2** (0.116 2)	0.200 5* (0.118 5)
细碎化程度	0.009 7 (0.016 3)	0.065 4 (0.081 5)	-0.025 4 (0.067 1)	0.030 1 (0.070 2)
农地离家距离	-0.006 2 (0.013 2)	0.028 5 (0.060 5)	-0.042 5 (0.049 0)	0.002 2 (0.054 0)
是否有流转	-0.008 4 (0.032 8)	0.007 2 (0.153 2)	0.131 8 (0.136 2)	-0.175 9 (0.137 3)
是否有撂荒	0.031 2 (0.063 9)	0.182 9 (0.278 8)	0.339 6 (0.257 5)	-0.106 8 (0.246 6)
常数项	0.586 6* (0.316 8)	0.977 3 (1.521 5)	-0.268 7 (1.231 0)	0.901 1 (1.396 7)
样本量	532	532	532	532
Pseudo R^2	0.159 4	0.159 4	0.120 8	0.131 2

进一步,将二轮延包政策细化为“再延30年”期限(*FPS1*)、“不打乱重分(顺延)”(*FPS2*)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FPS3*)后,回归结果表明,“信息充分性”“信息准确性”和民主协商也会对此产生正向影响,仅“信息准确性”对“再延长30年”期限政策的影响不显著。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使研究结果更稳健可靠,本文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和缩尾处理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替

换被解释变量。将政策支持度替换为农户延包满意度,满意度是农户对延包政策以及延包实施过程中的整体评价,具有一定的替代性,结果汇报至表6中列(1)—(3)。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结果具有稳健性。其次,进行缩尾处理。为避免极端值影响,本文对数据进行缩尾处理后再回归,回归结果见表6中的列(4)—(6)。结果显示,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对农户政策支持度的影响依然稳健。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延包满意度			删减样本量并作缩尾处理		
	(1)	(2)	(3)	(4)	(5)	(6)
信息充分性	0.046 0*** (0.013 6)	—	0.025 6* (0.014 3)	0.053 1*** (0.013 9)	—	0.033 9** (0.014 1)
信息准确性	0.216 6*** (0.030 8)	—	0.203 3*** (0.030 1)	0.369 7*** (0.084 8)	—	0.356 3*** (0.082 8)
民主协商	—	0.059 0 (0.058 3)	0.056 9 (0.055 6)	—	0.207 7*** (0.033 4)	0.174 3*** (0.033 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697 0** (0.314 6)	0.544 8* (0.322 3)	0.612 2** (0.308 3)	0.768 7** (0.325 4)	0.538 4* (0.325 6)	0.641 2** (0.318 6)
样本量	532	532	532	532	532	532
Pseudo R^2	0.165 2	0.129 9	0.209 5	0.118 7	0.117 6	0.160 3

（三）地形异质性分析

由于地形的细碎性、耕种便利性等会影响土地价值，进而影响农户对土地的处置方式以及对二轮延包政策的态度。贵州 XF 县是典型的山地丘陵，试点地区户均土地块数为 5.8，土地细碎化程度高；河南 PY 县是平原地区，土地规模性好，户均地块数为 2.3，机械化耕种程度高。因此，为克服地区细碎化的差异，进行地形异质性回归分析。

由表 7 可见，以贵州省 XF 县表征的山地丘陵地区，农户的“信息准确性”显著影响农户政策支

持度；而以河南省 PY 县表征的平原地区，农户的“信息充分性”“信息准确性”两者均影响农户政策支持度。可见，信息公开在平原地区对提高农户二轮延包政策支持度会产生更大的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山地丘陵地区，农地细碎化程度高，中青年农民外出打工比例高，即便地方政府采用多样化的宣传方式，其信息公开的覆盖面也有限。第二，山地丘陵地区农户居住较为分散，农户之间信息传递、交流的交易成本较大。

表 7 地形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山地丘陵地区（贵州省 XF 县）			平原地区（河南省 PY 县）		
	(1)FPS	(2)FPS	(3)FPS	(4)FPS	(5)FPS	(6)FPS
信息充分性	0.025 1 (0.024 9)	—	0.009 1 (0.024 9)	0.056 6*** (0.019 1)	—	0.048 5** (0.018 8)
信息准确性	0.408 5*** (0.143 1)	—	0.431 4*** (0.140 5)	0.404 9*** (0.107 4)	—	0.357 2*** (0.105 7)
民主协商	—	0.190 5*** (0.059 6)	0.185 2*** (0.059 7)	—	0.199 7*** (0.044 9)	0.166 3*** (0.044 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522 4 (0.503 1)	0.204 8 (0.508 8)	0.273 6 (0.500 0)	1.340 1*** (0.475 9)	1.106 5** (0.484 5)	1.079 2** (0.470 1)
样本量	237	237	237	295	295	295
Pseudo R ²	0.085 5	0.084 1	0.120 1	0.092 0	0.078 9	0.133 2

（四）交互效应分析

依据上文分析，本文引入交互效应模型检验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的交互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信息准确性”与民主协商交互项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政策支持度，表明民主协商对农户政策支持度的影响还取决于农户对二轮延包信息的准确性。

即当农户“信息准确性”较低且农户表现为政策不支持时，将弱化民主协商对农户政策支持度效应，即使征求农户意见（民主协商）也难以提高农户政策支持度。而“信息充分性”与民主协商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假说 H₃ 得到部分验证。

表 8 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的交互效应

变量名称	农户政策支持度			
	(1)	(2)	(3)	(4)
信息充分性	0.040 8*** (0.012 8)	0.043 4*** (0.014 2)	—	—
信息准确性	—	—	0.485 6*** (0.078 0)	0.426 0*** (0.081 9)
民主协商	0.188 6*** (0.033 1)	0.180 0*** (0.034 6)	0.202 2*** (0.029 7)	0.194 8*** (0.032 6)
信息充分性×民主协商	-0.002 1 (0.025 6)	0.004 8 (0.025 9)	—	—
信息准确性×民主协商	—	—	-0.619 9*** (0.155 3)	-0.592 1*** (0.157 8)
控制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544 5*** (0.036 0)	0.571 3* (0.322 4)	0.457 8*** (0.036 0)	0.518 5* (0.313 5)
样本量	532	532	532	532
Pseudo R ²	0.107 9	0.129 2	0.168 8	0.172 6

(五) 中介检验

1. 信息公开的中介效应

为检验信息公开是否通过影响农户公平感知进而影响农户政策支持度,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42]的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如表9所示,比较列(1)和列(5)的估计结果,当模型中加入农户公平感知变量后,农户的信息准确性对农户政策支

持度的影响系数由0.4226下降到0.1879,这表明“信息准确性”对农户二轮延包政策支持度的影响路径可以通过农户公平感知实现。此外,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表10), BS_2 和 BS_1 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公平感知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同时该检验说明中介效应的结果稳健。

表9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农户政策支持度		农户公平感知		农户政策支持度	
	(1)	(2)	(3)	(4)	(5)	(6)
信息准确性	0.4226*** (0.0848)	—	0.5057*** (0.0971)	—	0.1879** (0.0738)	—
民主协商	—	0.2087*** (0.0336)	—	0.1078*** (0.0396)	—	0.1589*** (0.0284)
农户公平感知	—	—	—	—	0.4641*** (0.0326)	0.4619*** (0.031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6570** (0.3272)	0.4968 (0.3238)	0.6049 (0.3747)	0.5021 (0.3824)	0.3762 (0.2782)	0.2649 (0.2721)
样本量	532	532	532	532	532	532
Pseudo R^2	0.0941	0.1167	0.0820	0.0473	0.3487	0.3784

注:在“信息充分性”影响农户政策支持度中,农户公平感知的中介效应不明显,囿于篇幅,此处不再汇报。

2. 民主协商的中介效应

同理,检验民主协商是否可以通过影响农户公平感知进而影响农户政策支持度。表9回归结果显示:民主协商能显著影响农户公平感知,且比较列(2)和列(6)的结果,当加入变量“农户公平感知”后,民主协商对农户政策支持度的影响系数由0.2087下降到0.1589,这表明民主协商对农户政

策支持度的影响也可通过农户公平感知路径实现。

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表10),民主协商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农户公平感知发挥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33%。以上检验说明中介效应结果稳健,假说 H_4 得到检验。

表10 Bootstrap 检验结果

检验项目		置信区间	P值	效应值	样本量	中介效应
信息准确性	BS_1	[0.0049, 0.0389]	0.028	0.0186	532	5.69%
	BS_2	[0.3858, 0.5341]	0.000	0.4641		
民主协商	BS_1	[0.0055, 0.0393]	0.015	0.0209	532	4.33%
	BS_2	[0.3897, 0.5300]	0.000	0.4619		

注:由Bootstrap法检验结果导出,重复抽样1000次; BS_1 表示间接效应, BS_2 表示直接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研究表明:(1)理论上,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可构成过程公平要素。(2)实践上,“政策宣传”“方案制定”两环节上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的强度与顺序设计不同,河南省PY县的公平效用要强于贵州省XF县。(3)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

能显著提升农户政策支持度,且两者存在交互效应;同时机制检验表明,农户公平感知作为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农户政策支持度。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全国大范围推进二轮延包工作提供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要设计好体现公平的延包实施方案。例如,针对部分农户因家庭人口变化导致农地分配不

均而产生强烈调地意愿的情况，需因地制宜设计多样化的“小调整”方案，如通过集体收益分红、公益性岗位优先就业权等方式，回应不同类型农户的延包诉求。同时，推进“县级方案—村级方案—组级方案”的细化，以公平的延包方案为基础推动二轮延包的顺利实施。

第二，要强化二轮延包实施的过程公平。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地方政府和村干部的工作培训，重视二轮延包的推进过程，杜绝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信息公开方面，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可通过正式制度公开信息、回应农户诉求；在民主协商方面，积极听取农户意见，让农户感到被尊重和认可，进而增强其公平感。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当地的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共同提高要素作用效果，促进延包过程公平。

第三，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动态公平管理机制。长期持续动态管理村庄人地关系，尤其关注特殊群体农地权益，如无地户、少地户、外嫁女、消亡户。持续推行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机制，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的公平性和适应性。动态管理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助于减少土地纠纷、缓解土地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也是响应社会变迁和人口结构变动的必然要求，从而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玲玲, 李长健.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体期限设置的思考——基于“轮+期限”与“适当调整”法律适宜性的探讨[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4): 82-89.
- [2] 罗婷婷, 陆林.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价值及配套政策思考[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8(5): 96-106.
- [3] 宋志红. 农村土地延包难点问题探析[J]. 行政管理改革, 2016(5): 43-47.
- [4] 刘强. 农地制度论(第2版)[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
- [5] 张兰, 孔岩, 樊鹏飞, 等. 非农就业、土地流转抑制了农户当前及二轮承包到期时土地调整意愿吗[J]. 农业技术经济, 2022(9): 122-133.
- [6] 刘灵辉, 向雨瑄. 第二轮土地延包中无地少地农户的权益保障策略研究[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 90-98.
- [7] 姚志. 二轮承包到期后农地调整的理论逻辑与社会影响[J]. 现代经济探讨, 2021(1): 104-112.
- [8] 丰雷, 蒋妍, 叶剑平, 等. 中国农村土地调整制度变迁中的农户态度——基于 1999—2010 年 17 省份调查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 2013(7): 44-58.
- [9] 刘玉珍, 程军. 土地调整的普遍性习惯与法律性规定的冲突及其化解路径[J]. 农村经济, 2019(3): 39-45.
- [10] 郑志浩, 高杨. 中央“不得调地”政策: 农民的态度与村庄的土地调整决策——基于对黑龙江、安徽、山东、四川、陕西 5 省农户的调查[J]. 中国农村观察, 2017(4): 72-86.
- [11] 汪险生, 郭忠兴, 宋宇, 等. 第二轮土地承包即将到期之际农户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意愿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3): 157-177.
- [12] 娄磊, 洪名勇, 钱龙. 农村新一轮土地延包 30 年效率与公平的研究——来自 Y 省 J 区 D 村调利不调地的案例证据[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188-196.
- [13] 姚志. 中国农村人地矛盾: 未现之谜与二轮延包处置思路[J]. 经济体制改革, 2021(6): 77-83.
- [14] 张晓明. 公平和效率: 一个历史和理论的分析[J]. 哲学研究, 1995(7): 18-26.
- [15] 王绪龙, 周静. 信息能力、认知与菜农使用农药行为转变——基于山东省菜农数据的实证检验[J]. 农业技术经济, 2016(5): 22-31.
- [16] 樊振佳, 史文杰. 21 世纪信息公平研究: 脉络、结构与展望[J]. 图书情报知识, 2023, 40(1): 137-150.
- [17] 宋保振. 公民信息公平权益法律保障的完善路径[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9(1): 18-31.
- [18] 王翔, 白劼. 公民参与的数字化“回声”: 信息公开如何塑造意见表达[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4, 13(4): 11-23.
- [19] 林延斌. 以协商民主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3): 47-51.
- [20] 李宁, 王芳. 互动与融合: 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中的协商民主[J]. 求实, 2019(3): 86-96, 112.
- [21] 胡小君. 民主协商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价值、实践与路径分析[J]. 河南社会科学, 2020, 28(9): 25-31.
- [22] 余敏江, 梁莹. 协商民主与政策执行网络[J]. 理论探讨, 2024(1): 146-149.
- [23] OSTROM E.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4] 李文钊.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传统、演进与展望[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6(6): 4-18, 125.
- [25] 钟文晶, 罗必良. 公共政策及其响应: 基于农民信任机制的解释——以农地确权政策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 2020(3): 42-59.
- [26] JACOBS S. Spontaneous order: Michael polanyi and friedrich hayek[J].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2000, 3(4): 49-67.
- [27] CHILDERS T, POST J. The information-poor in America[M].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75.
- [28] 李忠斌. 信息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及效应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S1): 579-582.
- [29] 纪月清, 张惠, 陆五一, 等. 差异化、信息不完全与

- 农户化肥过量施用[J]. 农业技术经济, 2016(2): 14-22.
- [30] 安海燕. 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认知及对其参与意愿和申请行为的影响研究——以试点地区为例[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7.
- [31] 何包钢. 协商民主和协商治理: 建构一个理性且成熟的公民社会[J]. 开放时代, 2012(4): 23-36.
- [32] 张广来, 廖文梅. 执行协商对农户易地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赣南原中央苏区为例[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8, 23(3): 185-195.
- [33] 郭道晖. 知情权与信息公开制度[J]. 江海学刊, 2003(1): 127-133, 207.
- [34] 韩大元, 杨福忠. 试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4(2): 58-62.
- [35] 肖明.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运行状态考察——基于2008年至2010年245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J]. 法学, 2011(10): 78-85.
- [36] 王克亚. 信息化对农户信息需求及决策行为的影响——基于河南省调研的实证分析[J]. 中州学刊, 2009(4): 43-45.
- [37] 陈若英. 信息公开—强制征地制度的第三维度[J]. 中外法学, 2011, 23(2): 270-284.
- [38] 丰雷, 孙丹, 严金海. 农民参与、程序公平与征地满意度——基于2019年“千人百村”调查的实证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 2021, 35(3): 29-39.
- [39] 罗明忠, 陈伟漫, 林玉婵. 民主参与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公平感知的调节效应[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110-122, 207.
- [40] 马婷婷, 陈英. 农民农地产权认知研究: 概念界定、量表开发和效度检验[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5, 29(12): 37-43.
- [41] 邹晓娟, 谢强强, 黄建伟, 等. 农户对土地确权的认知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的抽样调查[J]. 求实, 2016(6): 78-86.
- [42]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 731-745.

责任编辑: 黄燕妮

(上接第61页)

- [2] 焦晓云. 习近平关于劳模精神重要论述及其时代价值[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3(1): 16-22.
- [3] 彭维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模精神的重要论述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 2019(4): 154-163.
- [4] 路丙辉, 徐益亮. 劳模精神的生成逻辑与时代价值[J]. 道德与文明, 2022(1): 39-48.
- [5] 赵志阳. 新时代劳模精神的三维审视[J]. 长白学刊, 2023(3): 149-156.
- [6] 明芳, 石路. 从“劳工神圣”到“大国工匠精神”: 中国共产党劳模精神的百年建构与嬗变[J]. 当代教育论坛, 2021(5): 11-20.
- [7] 游海华. 新价值观构建与引领: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树立劳模的历史考察[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11): 81-94.
- [8] 陈莉莉, 柳建辉. 延安时期劳模荣誉表彰仪式的历史考察[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4(2): 59-66.
- [9] 杨冬梅. 新中国70年劳模事业成就与经验[J]. 湖北社会科学, 2019(8): 29-34.
- [10]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1] 许毅.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12] 中央苏区工运史征稿协作小组. 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M].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89.
- [13] 姚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劳模表彰及其社会效应[J]. 党的文献, 2013(4): 84-88.
- [14]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召开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N]. 人民日报, 1956-02-21(001).
- [15] 游正林. 我国职工劳模评选表彰制度初探[J]. 社会学研究, 1997(6): 16-23.
- [16] 中华全国总工会经济技术部. 新编劳模工作手册[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
- [17] 王嘉昊. 改革开放40年劳动模范的“变”与“不变”[J]. 中国工运, 2018(12): 51-53.
-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9] 习近平.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20] 习近平. 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4]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25] 申来津. 精神激励的权变理论[M].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3.
- [26] 王浦劬. 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引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J]. 政治学研究, 2024(4): 3-16.
- [27]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责任编辑: 曾凡盛